

《城市规划学刊》主编董鉴泓：

当前城市规划的热点在中国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今年,《城市规划学刊》创刊 60 周年。作为这份刊物的创刊人、主编,同时作为一名从事城市规划事业长达 72 年的专家,董鉴泓先生如何看待高校的“规划热”现象?中国城市规划如何与国际接轨?未来中国城市规划的方向是什么? 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董先生。

落脚点必须是中国城市规划问题

文汇报:董先生好,首先恭喜您创刊并一直担任主编的《城市规划学刊》(下简称《学刊》)在今年迎来 60 周年诞辰。您可否简单回顾下《学刊》的办刊历史?
董鉴泓:好的。《城市规划学刊》创刊于 1957 年,最早叫《城

乡建设资料汇编》(下简称《汇编》)。《汇编》先是油印本,后来改成铅印本,印数不多,主要作为内部资料在行业内赠阅。《汇编》上刊发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是我们系教师的学术成果,二是一些来同济讲学的外国专家的讲稿,比如苏联专家杜拉耶夫的讲稿等。《汇编》不定期出版,出了 10 期,“文革”停刊。
“文革”后,我恢复了城规教研室副主任的工作,就和大家商

量继续做《汇编》(更名为《城市规划资料汇编》),大家都很支持。《汇编》没有经费支持,我觉得应该想办法解决。我找了石家庄市城建局帮忙,他们很快给我们拨了经费。1978 年,《汇编》正式复刊,为双月刊。当时每期刊物都是我们教研室的陈运帷带着稿件乘火车去石家庄市编排付印的。《汇编》当时已经可以订阅了,我们的读者主要来自学界和业界。为了节省发行费,我们

教研室全体同志都参与包装和送到邮局寄发,一个人大概负责几个省市。1980 年,经费又有困难,我又去找南昌市规划处资助。再之后,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又帮了好几年。
1986 年,同济大学收回了刊物,改名叫《城市规划汇刊》(下简称《汇刊》),是东南大学齐康院士提议的。后来,为了增加刊物的学术权威性,我们又邀请了一些高等院校参与协办,目前

共请了 14 所高校,还有 10 所大的规划院。刊物不仅改为全彩页,2000 年后还制作了光盘,并出版了《城市交通》《城市发展与规划理论》两本增刊,后来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规划院专辑。
国家科委最初从 3052 种刊物中选择了 1227 种可以作为科技论文水平统计的刊物,《城市规划汇刊》一开始而且一直被列为统计源期刊。1993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 400 余位专家鉴

◀ (上接 13 版)

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先生对学生要求之严格可见一斑。1981 年他准备考研时,甚至有人劝他换个导师报考。“还没进师门,我就知道在董先生门下读书必须全力以赴。”

近 20 年中,董先生共带了硕士生 28 名、博士生 8 名,不算“高产”。在他的学生中,罕见地既有规划业界最高级别的行政领导(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又有学术机构中的顶级权威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

“闯海南”感受市场经济

1988 年,董先生受聘为海南省城乡规划顾问,开始了“赤手空拳闯海南”的征程。他告诉记者,在参加海口市及三亚市的总体规划评审会时,他发现海南的城市发展正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意识到这将是和原来的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完全不同的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和挑战。以往在其他地区做规划,主要跟政府部门沟通协商,而在海南更多的是与不同性质的公司、企业、房地产商打交道,需要了解外商的投资意向,研究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近年的经济发展动向等——这正是当前规划学界比较生疏和薄弱的。
他很快组织了一批青年教

师和研究生去海南“白手起家”,短短一年,他们就做了七八个详细规划方案。说到同济师生靠做规划赚钱,董先生笑称自己是“创始人”。原来,1981 年担任建筑系副系主任的他和时任副校长的徐植信应邀去西双版纳访问。到了当地,对方提出希望他们在森林里设计一所纪念馆。“考虑到来回机票什么的,我提出收他们 3000 元。”董先生说,这是同济的第一个收费项目。1986 年,同济成立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董先生任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所所长。上任后,他立即派人去北京向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申请城市规划甲级资质。“我们是全国高校研究所中第一个拿到甲级资质的!”董先生说,考虑到在海南业务量很大,1989 年他带着甲级资质证书,去海南筹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海南分所(后扩建为同济大学海南设计院)。刚去的时候条件艰苦,几个人就租住在民房里。1989 年底,董先生因病回沪,此时海南进入了开发低潮期。“好在海南分所最后挺过去了,迎来了 1991 年以后的发展新高潮。”他说,后来,海南分所一度人丁兴旺,最多时有 20 多个员工。

1991 年到董先生门下钻研的张尚武,在 1992、1993 年暑假曾赴海南设计院实习。由于他本科毕业后在广东省汕头市建筑设计院当过 3 年建筑师,董先生就让他直接做项目负责人,在海口周边完成了几个规划项目。有一次海南设计

院将参与海口市中心旧城改造的国际投标项目,董先生立马联系了学院的一批骨干教师去当地“支援”,担任项目指导。

“包括同济在内很多规划院校的师生,都是通过海南这个‘窗口’,接触到新时期规划实践。”张尚武说,海南设计院的成立是董先生长期提倡的“服务社会”办学思想的体现,“董先生特别强调教育结合实践,开展产、学、研合作”。他说 1990 年代后期,学校撤回了海南研究院,为后来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成为数以千万规划学子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平台。

有人认为董先生“闯海南”的经历,拖累了他个人的学术发展。“应该是有影响。”董先生想了想,回应道,“1988 年我 62 岁,我想去感受下市场经济。”

退而不休的“拼命三郎”

1996 年,根据学校规定,70 岁的董先生从同济离休。“我还不想退。”董先生说,他耿耿于怀在“文革”中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期,“我要发挥余热,把这十年补回来。”

今年,由他自 1957 年一手创办的学术性刊物《城市规划学刊》(下简称《学刊》,原名《城乡建设资料汇编》《城市规划资料汇编》《城市规划汇刊》)迎来了 60 周年诞辰。今年,是董先生担任这本刊物主编的第 60

个年头。《学刊》编辑部主任黄建中告诉记者,董先生到现在还亲自审稿,且时不时想出些前沿话题,要求编辑部去组稿。“董先生对稿子可以过目不忘!”《学刊》编辑肖建莉说,有些作者的稿子被董先生“枪毙”,隔了半年“改头换面”一下又来投,老先生能一眼看穿。

明天,“第 14 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即将开幕,来自国内外规划学界的五六百位学者、专家将齐聚一堂。这一学术论坛是董先生在 2004 年创办的,当时他已 78 岁高龄,他将论坛定位为“规划学科的博鳌论坛”。董先生说,筹备期间最“烧脑”的是拟定选题和演讲嘉宾——选题要“够前瞻、够学术”,嘉宾要“会搞规划,有影响力,还要会讲”。依据这两个标准,他今年邀请了来自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多位学者,讲述前沿话题。

论坛期间的一项议程是揭晓“第 13 届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这一评选从 2005 年开始,亦是当时 79 岁的董先生的原创,他将该奖定位为“规划界的范长江新闻奖”。董先生说,评奖活动是为了促进学术研究,最初是针对当年刊登在《学刊》上文章,后来为了扩大影响力,编辑部联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联合主办。如今,这一奖项的评选已有 6 家城规领域的重要期刊参与,是规划学界年度发表论文的最高奖项。

“我不去想自己有多大年

纪、不去想自己能有多长寿,只想干好眼下计划好的每件事。”董先生说。从 2010 年开始,董先生除了修订《中国城市建设史》(第四版),同时开工的还有一本对比中外城市历史发展的教材《中外城市建设史》,并策划专著《大跨度时空下的中国城市》,从更大的时空范围认识中国城市。

与学术上的能“折腾”相比,董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每天看看电视、读读报纸,再翻阅下几本主要的规划类学术期刊。身体好的时候,每周去两三次《学刊》办公室审稿。“今年夏天 40 摄氏度的高温,他也照常来‘上班’。”董先生的博士、《学刊》编辑部副主任王雅娟说,假期里有天老先生自己跑去办公室,恰巧没人在,他在门外坐了会儿,又自己回了家。几年前,董先生每个月固定与同济另外 3 位当年参加地下党的同志聚餐,且轮流做东。前些年,老伙伴们身体大不如前,有的过世了,活动取消。一天,他对黄建中、王雅娟、肖建莉说:“我们 4 个每月聚餐吧,轮流做东,从我开始!”前阵子住院,王雅娟带了两个肉夹馍去看他,这位西北老汉特别高兴,直说味道正宗。

采访快结束时,董先生家的门铃响了——“您的肉夹馍外卖到啦!”老先生笑起来:“就是王雅娟买给我吃的那家做的,我会让他们送货上门呢!”

